

Z O U X I A N G J U N H E N G X I A D E F A N R O N G

阮文彪 著

走向均衡 下的繁荣

——中国三农问题探索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五”优秀人才培养项目



走向均衡下的繁荣

——中国三农问题探索

阮文彪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均衡下的繁荣:中国三农问题探索/阮文彪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11

ISBN 7-81093-497-X

I. 走... II. 阮...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②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564 号

走向均衡下的繁荣

——中国三农问题探索

阮文彪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404 千字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7-81093-497-X/D·28

定价:29.5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阮文彪，男，1960年10月生，汉族，安徽铜陵人，教授，博士，安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现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农业大学农科教结合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农业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技术经济及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产业经济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学科组专家、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经济学会、农经学会理事，安徽财经大学合作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20多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国际学术会议论文7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和合作编著著作7部，译著1部；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科学）子课题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1项，主持和参加省级课题7项；荣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市厅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各1项、二等奖4项，2000年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1年被安徽农业大学评为“九五”先进个人，2004年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提名奖。

主要研究领域：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现代企业管理、新制度经济学、农科教结合理论与政策等。

走向均衡下的繁荣

(代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伟大任务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农民的期盼。这并不是说，过去我们不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者没有开展新农村建设。事实上，新中国、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种种失误，使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延缓了。1992年，本人曾在《农村经济社会学刊》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与政策思考”的理论文章，提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机制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在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上，重经济目标，忽视社会发展目标，未能从整体上正确处理好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辩证关系，从而不可能走上一条社会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农村发展客观上要求“坚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使农民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较快增长的狭隘目标中摆脱出来，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身体验中激发和增强农村社会主义的信念”；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看，都不能把注重和实现农村社会发展目标仅仅看作是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手段，而应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目的本身。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但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农村面貌未能发生根本改观，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的目标远未实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热情，而且需要科学和理性。没有发展的科学，也就没有科学的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不二途径。

三农问题错综复杂，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尤其是在经济相

对比较落后的中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学、按规律办事，切实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出并正视三农问题的根源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理论和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结构失衡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的问题。依靠制度创新，坚持综合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新制度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样，也有个投入产出问题，制度安排需要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均衡和机会成本均等原理加以合理配置，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一项制度安排对具有交互性的人类行为约束空间的最优均衡点在于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社会最优制度结构必须符合各项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均等的原理。

回首过去，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却是与“制度均衡原理”背道而驰的。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的社会实践大都没能考虑制度需求、制度成本和制度非均衡的社会经济后果，且不少制度变迁是运动式的，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根本不考虑社会经济承受能力，致使经济体制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利益格局过度扭曲，潜在的制度收益大量流失，广大农民成了旧体制的最大牺牲者。

中国过去在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方面之所以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观念的陈旧和思想的落后，尤其是全社会普遍缺失制度均衡的概念，这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强调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集权社会是分不开的。在“左”倾思想路线统治的年代里，政治原则代替了经济规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政治主张、“人定胜天”的政治热情被滥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很难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和走向均衡下的繁荣。以“农业集体化”为例，集体化并非绝对没有必要，问题是决策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济理性，无视市场机制的功能和制度均衡原理，以至各地在“集体化”的时间、路径、广度、深度上超越了当地的具体实际，搞了不切实际的“一刀切”、“大跃进”。这种极“左”思想和行为不仅导致了巨大的制度效率损失，而且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留下需要长期医治的思想贻害。在集体化的年代，人们是谈“包”色变，家庭承包制后广大村民百姓是谈“合”色变。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他们更习惯和偏好计划经济年代的管理方式，而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规范和执政方式则是知之甚少，因而在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化道路和奔小康的过程中就难免出现一些扭曲异化行为。如何摆脱农业和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走出“非

均衡”的樊篱，已成为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和迫切任务。

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就是农业经济学。当代中国最广泛、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是三农问题，最艰难、最紧迫、最繁重的任务是新农村建设。当然，在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了制度问题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结构、规模、技术、人力资本、科学管理等，都需要系统探索和深入研究，依靠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意识决定行动，思路决定出路。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临的问题众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中国农民和基层干部不乏创造性和追求美好新生活的愿望。目前，新农村建设需要优先考虑三大基本问题，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如何用好人管好钱”。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得不到优先和同步解决，新农村建设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口号，甚至成为一些人牟取个人利益的借口，其实践效果将无法预料。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新农村建设规划，这是必要的。规划的实施需要资金保障，要建设，就要有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个问题也许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在人口和面积占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农民自身积累能力低下，财政支农资金也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而新农村建设又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决不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依赖“等靠要”。如何弥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就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多、基数大，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可以认为，在一个拥有7亿农民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社会，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解决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出路，如何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有效缓解农村人口基数的压力，是新农村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实现现代化，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人才强国”战略，尤其是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过去，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不少是错误政绩观和错误执政理念驱使下的行为后果。时下，违背农民意愿，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强行要求农民贷款住“别墅”的现象已开始在一些地方出现。不难看出，在中国不少地方，总有那么一些干部无德无能，唯我独尊，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严重脱离当地实际，乃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为虎作伥、为所欲为，干部队伍中的问题屡见报端。可想而知，如果执政大

权掌握在这样一些“败家子”的手中，不说管好用好有限的新农村建设资金，恐怕再多的钱也不够挥霍，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受制约的权力十有八九会成为腐败的温床，不受约束的行为只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和低效。要解决新农村建设中“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如何用人管好钱”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制度设计和创新，尤其是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创新。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①

偏好的多样性和有限理性是人类的固有特征，制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在各种社会经济事务中形成理性把握的预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和节约交易成本。一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存在或者被创新，在于它能为人类提供某种服务，带来福利的增长。现代管理理论和预测手段的发展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对制度总需求的预测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人类的经济理性依然是相当有限的，即使是一些管理学大师们也不免有信息不充分的困惑。相对而言，只有行为主体才最清楚何时、何地、选择何种制度安排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能否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并为其提供保障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以引导和督促人们将心思、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生产性努力、更少地配置于分配性活动，也只有这样，中国农村才能阔步走向制度均衡下的繁荣。

1985—2005年这两个十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但同时也是产业利益失衡和城乡矛盾日渐突出、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增多的过程，三农问题则是产业利益失衡和城乡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表现。事实再一次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

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正视和大胆提出“三农”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次历史的伟大进步。我们深信，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终究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著 者

2006年8月18日于合肥安农大寓所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目

录

走向均衡下的繁荣（代序）	（1）
凤阳县农业机械化问题与战略	（1）
重视研究产业利益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8）
农户经营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	（18）
论区域开发农业中的几个问题	（22）
农业自然资源开发与政府宏观调控	（27）
论我国农业规模经济中几个问题	（34）
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与政策思考	（43）
优化农业经营方式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50）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思考	（57）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疑难的经济学透视	（65）
农业利益及影响因素的理论与现实考察	（71）
农业利益与政府保护	（80）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如何实施自我保护	（86）
论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建设	（90）
信息产业化过程中的农村信息市场	（96）
论政府经济职能	（99）
市场经济·农业发展·基层政府经济职能	（108）

技术进步·科技体制·农村技术市场建设	(115)
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兼与马晓河同志商榷	(122)
农业技术进步的体制障碍及化解对策	(128)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特点与趋势	(136)
论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147)
要的是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	
——关于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资本排挤劳动”的思考	
.....	(155)
存量变卖 余股改贷 政府退出 创设基金	
——无为县乡镇企业改制不设集体股的思考	(158)
关于农业产业化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	(161)
供销社的老本究竟能吃多久	
——从制度经济学看农村供销社改革的紧迫性	(171)
农业产业化发展亟待处理好五大关系	(174)
改革呼唤制度理性	
——兼与邓聿伟先生商榷	(179)
新古典国家理论与农民利益团体培育	(182)
技术创新机制、经营者队伍与农业产业化	(187)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徽农业结构调整	(191)
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197)
核心竞争力与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204)
论农民合作组织与市场农业发展	(217)
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	(228)
我国农业税费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	(234)

管理、制度与龙头企业创新发展	(241)
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长期战略与总体构想	(250)
认真学习“一号”文件 以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	(258)
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分析与政策建议	(265)
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及效率特征	(270)
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277)
三农问题呼唤政府理性	(288)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本质要求	(293)
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99)
宣传当先 诚信铺路 科技兴企 体制搭桥	
——加快和促进安徽农业东向发展的思考	(302)
凤阳县小岗村土地集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307)
凤阳县小岗村土地集并现象与公司农业探析	(31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创新	(320)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29)
后 记	(339)



凤阳县农业机械化问题与战略

农业机械化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已为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所证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不仅要受到资金、能源、劳动力出路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农机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农业机械化道路应因地制宜，针对各地的具体现状和问题采取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机化方针、政策和措施，以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一

安徽省凤阳县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现有农业人口 50.25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8.7%，农村劳动力 23.49 万人，耕地 7.22 万公顷，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拥有耕地 0.307 公顷（合 4.6 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业机械化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全县的情况看，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机械经营形式冲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户经营为主，多层次、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营格局。凤阳县的农机经营形式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其中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以国营为主的发展阶段，70 年代以集体经营为主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责任的迅速发展和完善客观上要求农机经营形式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带来了农机经营形式的深刻变革。从 1980 年开始，农机经营开始由集体经营向生产组经营过渡。在农业生产责任制走向全面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农机经营形式变革的速度也随之加快，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户经营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机经营新格局。

1985 年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249 台, 11 890 马力, 其中农户所有和经营的分别占 59.80% 和 75.5%; 小型拖拉机 4 903 台, 58 894 马力, 其中农户所有和经营的占 99.45%; 农用载重汽车 184 辆, 15 792 马力, 其中农户经营的分别占 68.6% 和 65.4%。1985 年全县农机总值 4 149 万元, 其中农户所有 3 737 万元, 占 90%。

(2) 农业机械经营形式的变革和农机数量的增加以及一定程度上机械作业水平的提高,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增强了农业抗灾保收的能力, 密切了城乡经济交往。由于农机经营形式的这一变革适应了以户经营和农业生产小规模、灵活多变的特点, 加上近年来农机化经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小型拖拉机数量的增加, 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全县农机总动力 1985 年 162 219 马力, 比 1980 年 99 525 马力增长了 62%, 机耕地面积由 1980 年的 0.83 万公顷增加到 1985 年的 2.28 万公顷, 1985 年农用拖拉机作业量达 927.97 万标准亩, 其他田间作业如机械播种、机械植保等作业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农业运输作业量 27.16 万吨公里, 农业机械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农村基本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县 1985 年农业总产值 24518 万元, 比 1980 年增长 71.1%; 农业纯收入 2 323 521 万元, 比 1980 年增长 278.6%; 按耕地面积计算的粮食亩产 452 公斤, 比 1980 年增长 66.20%; 棉花单位播种面积产量 29 公斤, 比 1980 年增长 176.2%; 农机经营总收入 1 828.785 6 万元, 其中经营单位所得纯收入 1 200 多万元。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部分劳动力, 1985 年乡镇企业劳动力 9 163 人, 比 1980 年增加了 7 200 人; 产值 6 545 万元, 比 1980 年增加 6 316 万元。

(3) 农机经营形式的变革对农机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 凤阳县已形成了以户经营占绝对优势的农机经营新格局, 已有农机户 5 549 户。从发展的趋势看, 尽管农机经营有向联户和合作经营逐渐过渡的趋势, 但目前这一格局至少在“七五”期间不会有很大的变动。上层建筑客观上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过去那种以集体经营为主的农机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农机经营形式这一变革的要求, 近几年凤阳的实践也日益暴露出旧体制的弊端。因此, 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改革旧的管理体制, 建立一种新型、高效、在农机供产销和技术服务等方面能够与目前农机经营格局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新型的农机管理体制应该是以农机户为主要服务对象, 有利于农机化经济效益提高以及保证农机化发展规模、速度和经济效益密切结合的管理服务体系。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凤阳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和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影响“七五”期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and 全县农村经济的振兴。要因势利导地引导农业机械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就不能只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更不能以旧意识和观念对待新的问题,而必须不断地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农业政策方针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1)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且已出现停滞的趋势。1985 年全县每公顷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 2.25 马力,农机总值 574.5 元,其中每公顷耕地拥有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分别为 0.15 马力和 0.75 马力,每公顷耕地拥有的排灌动力机械只有 0.30 马力。1985 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33.33%,拖拉机平均每台年作业量 1 807 标准亩,但田间作业量比重低,机收面积也只占播种面积的 1.26%。

在农机化管理方面下,县以下农机管理服务单位年末共有农机人员 7 224 人,其中拖拉机驾驶员 6 320 人中,有证驾驶的只占一半,农机技术人员只有 11 人,修理工 93 人,管理干部 31 人中绝大部分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难以胜任农机核算、发展规划等较为复杂事务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工作。

1985 年全县 45 个乡(镇)347 个行政村只设有农机修理网点 29 个,年末职工人数 96 人,农机化服务水平已严重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由于农机化服务跟不上,影响到拖拉机完好率的提高(1984 年大中型拖拉机完好率 77%,农用汽车 79%),1978 年以来,每年重大事故都在 10 起以上。

从调查分析中还可看到,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凤阳县农机化发展主要倾向于农机数量的增加,对农机作业水平和农机化管理水平以及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与提高重视不够,使得农机投资出现了较大程度上的盲目性。目前,农机化事业已开始出现停滞的现象,除了表现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田间作业水平提高不快外,还表现在数量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尽管我国的农机化并非单纯是强调农机数量的增加,但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可能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利于未来农机化事业发展的深层原因。凤阳县农业机械增加最快的是小型拖拉机,1981—1983 年三年间净增 2 829 台,平均每年净增加 943 台,1984—1985 年两年平均每年净增 396 台,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反而由 1980 年的 297 台减至 1985 年的 264 台,其他作业机械增加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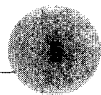
或根本没有增加甚至减少。

(2) 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不适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关系密切的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没有相应增加。如不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凤阳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只注重与田间作业和农村生活设施建设有关的小型拖拉机数量的增加,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畜牧机械等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85年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已由1980年的2891台减少到1721台,畜牧机械由1980年的256台减少到1985年的111台,尤其是排灌机械与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没有增加,排灌动力机械已由1980年1692台/54093马力减少到1985年的1093台/38628马力,农用水泵由1980年的113台减少到1985年的1076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则根本没有增加。这种状况严重不利于对多种土壤类型的土地资源的利用、保护和改造。该县灾害性天气频繁,特别是旱涝灾害,低产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8.7%,可垦荒地近0.2万公顷,1985年0.75万多公顷农业用地遭遇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受灾面积11486公顷,其中绝收面积6315.7公顷,八年中受灾最重的1978年受灾面积59942.2公顷,其中绝收面积39333公顷。

(3) 农机型号繁杂,配套不合理,造成农机管理工作的多杂乱和农机作业中的大马拉小车,影响了农机化经济效益的正常发挥。该县1985年大中型拖拉机有17个型号,小型拖拉机20个型号,大型拖拉机机具比为1:1.01,基本上是一机一具,小型拖拉机机具比为1:0.85。如此多的型号必然增加了农机服务、维护和保养、农机配套等工作的复杂性,不利于农机作业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正常发挥。

(4) 虽然目前农机作业专业户的经济效益尚好,但他们对进一步提高经营经济效益信心不足,农机经营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具有吸引力,农机投资的积极性已明显衰减,且部分专业户有摆脱农机经营的心理。在全县5549个农机经营专业户中总的来看是农机服务修理专业户的经济效益高于农机作业专业户,作业专业户高于种田户。然而,作业专业户现在对农机经营的积极性不大,关键的原因在于经营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经济效益也难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旦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出路,现有的作业专业户将有可能从经济利益的比较上放弃农机经营而另谋出路。那时,农机化事业将有可能面临一场严峻的危机和挑战。

农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系统的结构变化和运行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凤阳县上述现象和问题的产生也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有：

(1) 在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有限、资金积累缓慢的情况下，国家停止了农机财政拨款。1985年是该县农业纯收入最好的一年，全县农业纯收入总额23 521万元，人均433元。凤阳的农业也和全国一样刚刚恢复元气，农业纯收入中除了基本生活消费外，农民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以住房修缮，所剩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极其有限，况且农机投资处于扩大再生产的较高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自1980年开始停止了农机财政拨款，改为农机贷款，近几年农机贷款大幅度增加，但大都是用以购置拖拉机跑运输。1983年农机贷款175.6万元，全部用以购置拖拉机。在农机贷款的发放上，没有考虑到资金投放的合理结构和总体经济效益，造成了前两年拖拉机盲目发展、后两年运输拖拉机在作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向田间作业等方面转移的困境。

(2) 农业机械质次价高，投资经营风险大。这是1983年以来农机数量增加速度减缓的一个主要原因。一台小四轮拖拉机1981年价格为3 200元，1985年上升到4 150元，折合小麦15 000公斤，价格上涨30%，加上农机作业成本高昂，仅油料费和修理费两项成本就占农机作业收入的26%，且经营不稳定，一次性投资大，风险高，这对长期受小农思想影响至深的农民来说，一时还难以适应。

(3) 燃料供应严重不足，有机无油，难以保证机械的正常运行。1981年平均每马力供应柴油45.52公斤，1985年下降到26.59公斤，按12马力柴油机计算，平均每台每年只供应319公斤，在使用合理的情况下，也只能跑一个多月。计划外油价更高，1985年高价油比重占到22%。

(4) 农机管理体制不健全，农机服务跟不上，农机管理干部的平均文化水平低，机械构成不合理，供产销严重脱节，不能适应以农户经营为主、多层次经营形式变革的需要。该县的农机供产销在体制上形成“三重管理”，所属经委的农机公司和农机厂由于各自的经济利益不能协调配合，实际上农机厂已名存实亡。该县的绝大部分农机产品由农机公司从外省进货，结果吃亏的是农民和经营单位。农机局由于部门隔阂，不能对农机的制造和销售起指导和制约作用，不能实行有效的反馈，反过来又给农机化经济效益的评估和农机化规划工作带来了困难。农机服务在服务网点、人员、技术等方面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农机户需要服务时往往是“望机兴叹”、“送机住院”。

(5) 农机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机械和劳动力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而无法转移出去，农民不愿花钱买清闲。在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之前，其发展规模、速度必然要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应